

着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

徐明棋

核心观点

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重大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如何落实,最终取决于“新作为”,取决于一项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进。要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能级,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就当前看,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的一些具体措施可能需要快速推进

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构建了初步与国际接轨的贸易便利化管理新体制,这一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落实《WTO 贸易便利化协定》具有重要的推广借鉴意义,也直接提供了我们与沿线国家构建便利的贸易电子通关网络的条件。从标准计量、测试认证、会计审计到法律服务和纠纷仲裁, 上海集聚了国内外一大批现代化专业服务机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着海外避税地和很多国家多样化的税制竞争。探索服务业的离岸税制,为我国各类服务业企业到“一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在取得了三年改革开放创新试验一系列成果之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了升级版。市委、市政府在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市性重要会议,即为全面深化自贸区改革开放推进大会。这次大会也是市委、市政府继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9月成立、2015年4月扩区以后召开的第三个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大会。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央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好新一轮自贸区改革。

正确把握“桥头堡”的新定位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创设与改革开放创新试验具体措施的推进,始终是为国家对外开放大战略服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试验一

开始就对标 TPP,为推进我国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压力测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潮,面对这一逆流,习近平主席在参加达沃斯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明确地阐述了我国继续推进全球化,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立场,表达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决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扩大全方位开放的理念,成为我国推动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就必然要承担起中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示范作用,成为我国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风向标。上海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进一步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应对 TPP 和与美国谈判 BIT 的压力,而是要主动利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

要将改革同服务“五通”嫁接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取决于上海能否把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嫁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提供服务。

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际竞争已经变得非常紧迫。上海自贸试验区必然要承担这一先行先试的重任。

上海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港口的交通十分便利,把上海港建成连接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枢纽具有天然条件。但是,上海要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枢纽,还缺乏很多配套的便利化开放型管理体制。因此上海需要在港区一体化试验上加快步伐。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理应成为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融资平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推进,探索如何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账户为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提供便利的资金融通和投资保险以及信用保障等各类服务,探索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规模和使用深度。

落实国家战略要有“新作为”

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重大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如何落实,最终取决于“新作为”,取决于一项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进。要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能级,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就当前看,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的一些具体措施可能需要快速推进。

首先,要利用已经存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网络关系,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经贸合作的主要对象,商讨共同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或者贸易合作园区的可行性,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作为推动与对方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抓手。

其次,增加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港和空港班轮和航班,为上海成为连接国内外重点口岸的亚太供应链中心枢纽奠定物质基础。

再次,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股市通、债市通机制,打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交易网络。

最后,利用 FT 账户,有选择地率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通双向投资通道。在上海股权交易所设立“一带一路”国家金融资产交易板块,率先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创新。

当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与上海整个城市功能的提升也是紧密相关的,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与“一带一路”要实现的“五通”也是密不可分的,“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顺利建成将使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出色。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建

将呈现最早中国都城历史风貌

新华社郑州6月11日电 (记者桂娟)“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11日开工奠基。两年多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将向公众呈现最早中国都城的历史风貌。

据介绍,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项目占地208亩,建设规模3.1万平方米,总投资6.3亿元,计划于2019年10月建成,届时将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

规划占地613亩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与博物馆同步建设,将对宫城城墙、宫殿建筑基址群、“井”字形道路、铸铜作坊遗址、绿松石作坊遗址、祭祀遗址等进行保护展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颀玉才在奠基仪式上讲话时指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的建设,是让埋藏在伊洛平原的文物、书写夏朝历史的文献“活起来”的典型项目,有利于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

文明悠久历史,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二里头遗址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中国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其都城面貌不断揭示。

二里头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发现中国最早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中国最早“禁紫城”——宫城、中国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中国最早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并首次在宫殿区发现成组贵族墓及随葬其中的绿松石龙形器。用于祭祀与宫廷礼仪的青铜酒器、乐器、武器、玉器的出土,昭示着早期王朝的礼制传统。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在这里,我们已初步探明了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勾勒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勾勒出“中国硅谷”的发展史略

《中关村笔记》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6月11日专电 (驻京记者周渊)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关村管委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关村笔记》研讨会日前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该书由知名作家宁肯耗时两年对中关村众多风云人物进行深入采访写就,这部以小说家目光为中关村写史的非虚构力作获得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

《中关村笔记》在田野调查与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以人文性笔调书写不同阶段的中关村代表人物怀抱理想、奋勇拼搏的艰辛历程。全书从与华罗庚、陈省身并列为中国数学“三驾马车”的中科院院士冯康开篇,以“沉默的基石”向这些现代中关村的奠基者致敬,包含

陈春先和中关村硅谷梦、柳传志和联想、王志东和新浪、程维和滴滴打车等在内的19个段落和手记,以朴实的描述和缜密的细节,书写中关村如何以科学技术引领时代潮流的宏阔历史。

作为科技创新题材的精品力作,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今年4月推出以来获得如潮好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桦在研讨会上表示,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关村神话以外,作者沉潜到中关村过往的历史中,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勾勒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而崛起的“中国硅谷”中关村发展史略,也凸显了《中关村笔记》在众多描写中关村的文学作品中的不可替代性。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于2013年正式启动,是由中科院、科技部联合河北、山东、辽宁和天津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致力于提升环渤海中低产田粮食增产能力。图为中科院南皮站工作人员在实验大棚内查看、记录试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在沪举行观摩交流会

6月12日,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上海欣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彭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电视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观摩交流会将在沪举行。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讲述的是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乡农民彭兆旺发明香菇菌棒栽培技术,带领乡亲摆脱贫困的故事。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如同主人公彭兆旺一样朴实无华。整部纪录片娓娓道来,语言平实、场景直观,具有一种“泥土气”的质感,但观赏后却给予人巨

大的思想震撼和精神冲击。这种力量来自一个普通人物身上所透出的精神高度和人格魅力,也来自于一个普通农民为脱贫致富所展示出的坚韧执着和惊人创造力。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并不局限和满足于对主人公不平凡经历和贡献的展示,而是力图在叙述中挖掘彭兆旺成就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使该片避免了流水账的罗列,而具有反映改革开放新的时期的农民精神世界的气度、胸怀和分量。

该片荣获第22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佳作品大奖。

南京发现南方地区最大唐墓

200余件新出土文物展现金陵“地下之美”



镇墓兽



牛车



男女侍俑

均吴小宝摄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作为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一项重要活动,《发现金陵地下之美——南京考古2016年度成果展》10日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揭幕,文物部门揭秘了2016年于南京地下首度发现的唐贞观年间大型墓葬群勘探情况。据介绍,这是南京地区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唐代官墓。

三座唐墓创南方考古之最

该展览集中介绍了2016年度南京十项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并展出了200余件新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很多发现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胡宁介绍,雨花台区冯韦村后头山墓地是2016年南京考古界的聚焦所在,考古专家先后在这里发现了30多座从六朝时期至明代的古墓,其中最早的是东晋梁州刺史张光家族墓(2015年发现)。发现张光家族墓后,考古人员继续在该墓葬附近进行勘探,又发现了唐代、宋代、明代的多座墓

葬。首先发现的三座唐代墓规模宏大、结构精良,是我国南方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唐代墓。

该展览特别展出了在这些唐墓中发现的最为精美的一批葬品,其中不仅有栩栩如生、姿态各异的侍女武官陶俑,还有和现代农家家禽外形极为相似的动物陶俑,令人感叹1000多年前的工匠技艺如此出神入化。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教授贺云翱认为,这一唐墓群中发现的带有黄白釉的出土陶器葬品,造型非常优美,从风格上来看,与唐洛阳的陶器极为相似,实际上却是南京本地的烧制品。这一方面反映了唐代江南地区已经可以制造如此精美的陶器俑器,在技术和艺术上并不逊于当时的北方;另一方面则说明唐代江南地区已经和当时的北方中央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在文化上也有交流。“这是一次重写历史的考古发现,提醒我们应重新看待唐代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发展程度。”

明城墙砖也有“南京造”

几件带有“应天府上元县”“上元县提调官”铭文的明代城砖残件,证明

了除江西、安徽、湖北等外省烧造,南京明城墙所用的大量城砖也有南京本土制造。位于栖霞区摄山街道的官窑村,在2016年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了近百座大型砖窑,从中出土的明代城砖残件上清晰地看到了这些珍贵的铭文。

城砖是南京城墙建造工程中最大宗的建材。初步估算,明初修建的京师城墙使用城砖约3.5亿块。南京城墙规格相同,大部分都有铭文。铭文信息包括:产地、单位、烧造工程负责人、窑匠、人夫等,以便追查有据。过去学者们认为,南京明城墙的城砖是从安徽、江西、湖北等外省沿着长江运过来的,南京本土并没有烧造。但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南京也烧造明城砖,因为“应天府”“上元县”都是明初南京的称呼。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2016年对官窑村的官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窑98座、烧坑10个,目前已经发掘13座窑,多为明代窑。根据窑的形状,可分为圆形、马蹄形、长方形和梯形四类,其中圆形的数量较多,均见火膛、窑床和烟道等结构。这次发现的窑址是南京已发现古窑址遗存中数量

最多、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窑址群,可以确定与南京明代城墙砖的烧制有关。

胡宁说,最有价值的是城砖砖的标本,这块砖上刻有上元符铭文“应天府提督上元”,真实准确地印证了这里是当年明城墙砖的烧造基地。目前该遗址已被保护起来,未来将打造成考古遗址公园,呈现当年砖窑窑址的情景。胡宁认为,该遗址的发现,不仅有利于南京宣传和推广明文化,还有望在南京明城墙申遗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近年来南京城市建设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每年承担的配合性考古任务也随之激增。去年,南京考古工作的总量比往年增长了158%,全年共承担各类考古项目246项,发掘面积1.05万平方米,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500余件。本次展览推出的十项考古新发现,还有江宁区林陵镇中庄周代遗址、高淳区夏家墩春秋土墩墓遗址、雨花台区铁心桥吴尚村孙吴墓葬等。

(本报南京6月11日专电)

“他连水泥标号都记得”

——廖俊波的“细功夫”

在廖俊波的办公桌上,层层叠叠的材料之间,摆放着一红一黑两支不同颜色的笔。黑笔快速记录,红笔划出重点,这是他20多年前当老师时就养成的习惯。进入机关工作后,不论开会、走村入户还是外出招商,廖俊波都随身带着两支笔,繁杂的工作很快变得井井有条。

磨刀不误砍柴工,廖俊波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到任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后,廖俊波的行李中多了一样东西——武夷新区总规图等五张图纸。“每次和廖书记外出招商,我都背着一个图筒,在城市里显得很扎眼,经常被问了又问,查了又查。”武夷新区总工办主任熊华强说。

与客商交谈时,他总是动作熟练地

铺开图纸,逐条逐项地讲解,不用任何讲稿。熊华强说:“他讲得太细致了,有一次一个客商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从哪里请来个工程师冒充市长!”

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路走来,廖俊波练就了一身的“细功夫”。

在位于南平市武夷新区的闽铝轻量化车间,一架架制作精良的汽车车身,在灯光照耀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车间上空悬挂的“弘扬俊波精神”大红色条幅引人注目。

今年2月底,持续降雨使还在建设施工的闽铝轻量化项目进度受阻,廖俊波向项目负责人伊雄建议,换一个标号的水泥会更容易凝固,这样投资不会增加多少,施工时间还可以缩短。“我是一个搞工程的人,却没想到他连水泥标号都记得,还能从这里抠出时间。”伊

雄感慨道。

同样是因为闽铝轻量化项目,武夷新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张颖也领教了廖俊波的“细功夫”。一天,廖俊波拿着项目建设进度时间表,指着“钢构柱梁吊装3月17日至29日”问张颖:“这个有问题吗?2万多平方米的面积,我估计12天干不完这个活啊!”张颖随即向施工方核实,情况果真如廖俊波所言。“幸亏他发现得早,我们还有时间补救,要不然这个项目肯定得拖工期了。”说起这个细节,张颖至今仍感到惊讶。

今年2月,武夷新区掀起推进项目建设的“百日攻坚”,这成了廖俊波生前最挂心的事。为了更好地服务软件园内的企业,廖俊波召集企业家座谈,现场梳理出10个共性问题、19个个性问

题,要求在场的各部门盯紧落实、逐一解决。

3月14日一大早,廖俊波要乘高铁到北京对接项目。临走前,他把武夷新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蔡献全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份自己连夜拟好的“百日攻坚”亟须解决的问题:忙而不乱问题、能力提升问题、敢于碰硬问题、程序繁琐问题、督查考评问题……

廖俊波叮嘱蔡献全:“你好好思考一下,把这篇材料认真整理整理,下一阶段就要以这些问题为导向继续推进……”

拿着廖俊波的手稿,蔡献全含着泪对记者说:“这份作业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却再也无法亲手交给他。”

新华社记者 王成 涂洪长 (新华社福州6月11日电)